

万里茶道：亚欧文明互鉴的历史见证

□ 黄柏权



万里茶道是17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跨越亚欧大陆的一条重要国际商道，途经今天的闽、赣、皖、湘、鄂、豫、晋、冀、内蒙古等国内九省（自治区），在当时的中俄边境城市恰克图进入俄国，并从俄国西伯利亚延伸到圣彼得堡，是中国南方各产茶区与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和东欧平原之间以茶叶贸易为主的水陆混合交通路线。

万里茶道的兴起与衰落

1656年，费·巴依科夫使团抵达北京，拉开了茶叶从中国直接销往俄国的序幕。最初俄国商人从北京等地购买茶叶，交易量十分有限。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万里茶道的开启。1728年，根据中俄《恰克图界约》规定，在恰克图开市贸易。之前经营北方边茶贸易的晋商抓住历史性机遇，开始从南方茶源地采购茶叶运到恰克图。恰克图迅速成为中俄茶叶贸易集散地，万里茶道的运销线路正式形成。

历史上万里茶道最长的线路是从武夷山出发的运输主线路，即从福建崇安下梅等地出发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河口镇，然后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过九江，溯长江至汉口，转汉水至樊城，北上经河南赊旗（今社旗县城所在地）进入山西，再运至张家口，出关后驮运向北，经库伦运至恰克图，然后进入俄国，经过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秋明，直到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其他茶源地的茶叶也通过水路经武汉口后进入万里茶道主线，共同构成今天中蒙俄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线路。

除了以上主线外，还有两条运输线路：一是茶源地—汉口—上海—天津—张家口—恰克图线，在1861年汉口开埠后形成，是在汉口直接经营茶叶的俄商贩运茶叶回国的主要路线，在汉口以南和张家口以北仍然走传统线路；二是茶源地—汉口—上海—海

参崴线，再经（1904年初步通车的）西伯利亚铁路运销俄国各地。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此条主线逐渐失去作用，1911年停止运茶。20世纪20年代，存续200多年的万里茶道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万里茶道的五个特征

万里茶道作为贯通中国南北、跨越亚欧大陆的国际贸易通道，是当时欧亚大陆上距离最长的内陆商道，具有如下鲜明特征。

线路穿越的复杂多样性。万里茶道从中国南部茶区出发，自南至北几乎贯通中国全境，进入今天的蒙古国和俄罗斯，最长穿越14000多公里。跨越了亚热带、北温带、寒带等多种气候带，从南方湿润地区到半干旱、干旱地区，气候类型复杂多样。从南方山地，经过长江中下游平原、华北平原、黄土高原、蒙古高原、戈壁沙漠、西伯利亚平原、东欧平原等多个地理单元，跨越多种地形地貌。万里茶道将南方山地复合经济文化区、南方稻作经济文化区、北方旱作经济文化区、畜牧经济文化区和西方工业经济文化区等多种经济文化类型串联起来。这一洲际贸易线路覆盖地域之广阔、线路之漫长、穿越地形地貌和气候类型之复杂、连接经济文化类型之多样，在历史上极为罕见。

线路起点多样、中心突出。万里茶道的起点包括武夷山茶区、黄山祁红茶区、雪峰山黑茶区、武陵山东缘宜红茶区、幕阜山两侧的羊楼洞茶区和宁红茶区等众多茶源地。各茶源地的茶叶经由山间茶道及长江水系各支流，汇聚到万里茶道上最大的茶叶集散地汉口，然后汇入万里茶道主线。从汉口出发的茶叶通过多条运输线路再次汇聚到另一个集散中心——当时的中俄边境城市恰克图，然后分别运往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中亚和欧洲地区。

线路总体呈放射状分布。一是在初级市场以集散地为中心的运输线路向四周辐射。如宜红茶集散地渔洋关，接纳石门、鹤峰、长阳等地的茶叶。二是在中级市场以汉口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茶叶从各茶源地的集散中心出发分别从东南部、南部、西南部、西部几个方向沿水陆交通汇聚汉口，然后又以汉口为起点分别向西北

方、北方、东北方、东方运往各地。三是以主线节点市镇为中心向不同方向延伸出多条运输线路。如茶叶运到樊城后，一路向东北经赊店、洛阳，过黄河，继续沿主线前进；另一路往西北经老河口、西峡走丝绸之路古道，抵达中国西北地区以及中亚和俄国。

多维一体的茶叶之路。万里茶道以茶为主体，同时衍生出多维社会功能。一方面，围绕环环相扣的茶叶生产、运输、贸易和消费的产业链条展开，不仅衍生出与茶叶运销相关的各类服务产业，而且茶道上还辖内地地的布匹、粮食、手工业品和来自北方的畜产品、皮毛、药材以及欧洲的工业产品。另一方面，万里茶道将南方和中原的生活习俗、信仰礼仪、文化艺术、思想观念传播到北方及俄国，也将俄国及蒙古高原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播到中国内地。

活态存在的文化线路。作为文化线路遗产，万里茶道部分功能仍然活态存在。一是生产经营的活态延续，从前的古茶园仍在种植、采摘茶叶；茶源地一些山间古茶道、桥梁、码头、商业街区等仍在正常使用；历史上一一些知名老茶厂从未停止生产运营。二是品牌和生产工艺代代相传，武夷红茶、宜红茶等历史名茶至今畅销，历史时期形成的制茶工艺传承有序，依旧保持着独特的风味。三是万里茶道历史上形成的茶文化枝繁叶茂，如安化《十二月采茶歌》《鹧子尖茶引》还在传唱，鹤峰的四道茶礼俗仍旧在民间保留，是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万里茶道的历史作用

万里茶道在历史上将中国南北市场融为一体，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和国内大市场的形成。万里茶道茶叶运销促使南方山区茶源地改变了传统的种植模式，大量农业人口投身到茶叶生产和加工中，改变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其生产的茶叶直接参与国际贸易，成为商品生产者。茶叶生产吸收了大量妇女儿童就业，给当地百姓提供了就业机会。在茶叶生产、运输、贸易的线路上，促进了福建下梅、星村，江西河口、九江，湖南黄沙坪、唐家观、羊楼司、宜沙，湖北羊楼洞、渔洋关、陆城、襄阳，河南赊

旗、洛阳，山西长治、祁县、太原、大同、杀虎口，河北张家口，内蒙古归化、多伦、二连浩特、包头等市镇的形成或繁荣。同时衍生出诸多与茶叶相关的产业，如手工作坊、客栈、饮食店、钱庄、当铺、药房、米店、镖局、戏班等，为百姓就业提供了多元选择。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之后，联结南北各地、水陆并用的国内大通道，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实现南北各地区、各民族的生计互补和互通有无。茶源地种植、加工的茶叶通过万里茶道向北运送，满足了北方各民族的生活之需，也实现了南方各民族茶叶生产的经济价值。对于南方山地茶农来说，茶叶是换取粮食和日常生活物资的特产；而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茶叶是必备的生活资料。唐代以后，南方茶叶逐步成为西北少数民族不可或缺饮品，如安化和羊楼洞黑茶压制的砖茶，曾是草原上可以充当货币使用的硬通货。此外，中原和南方各民族也需要把茶叶销售到北方，换回马匹、牛羊肉、皮毛、山货等，以满足中原和南方农耕经济和农民的生活所需。茶叶是南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茶叶贸易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互信，加强了各民族的认同和团结，因此，万里茶道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

万里茶道不仅是贸易往来通道，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古老的中国茶文化与各国历史文化相结合，衍生出世界各地独具特色的茶文化。17世纪，茶叶传至俄国。到18世纪，饮茶之风遍及俄国社会各阶层，茶叶进入居民生活必需品之列。俄国人在茶水中加入糖、柠檬、牛奶、乳皮、香草等辅料，形成独特的俄国茶文化。1778年，利西岑开办了俄国第一家茶饮制造工厂。从此，精美的茶饮成为俄国茶文化和俄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标志。茶叶也逐渐融入俄国文学、艺术、礼仪和生活之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浪漫的休闲情怀、精致典雅的生活态度，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欧洲工业文明成果也经万里茶道传入中国，达到了中西方互通有无、合作共赢的效果。因此，茶叶扮演着跨越欧亚大陆的文化使者角色，万里茶道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

（作者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

“共和国军垦第一城”石河子坐落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南缘，天山中段支脉北阳山北麓，北疆第一大河玛纳斯河的西岸，因所傍河流干涸、河底石头裸露而得名。历史上，这里不仅是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也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交通衢地，更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在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历史上中央政府对于石河子地区的治理

秦汉之际，乌孙游牧政权控制了天山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石河子位于其辖地的东境。西汉中央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以后，“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局动荡，柔然和高车等游牧势力活跃于此。北周时期，突厥叶护室密管辖此地。隋朝时期，石河子归属于西突厥的统治之下。

唐朝初年，中央政权统一西域，逐渐强化对西域的治理。648年，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降附于唐朝，石河子连同西突厥所治大片疆土归属于唐。651年，阿史那贺鲁谋反叛唐。唐将苏定方痛击阿史那贺鲁，并于658年彻底平定叛乱，石河子复归于唐朝管辖。中央政府先后设置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管辖包括天山以北在内的广大西域地区。武周时期，北庭都护府于今石河子一带置镇城，派遣军民在此屯驻。唐玄宗天宝年间，为进一步加强天山北麓军防，析北庭都护府轮台县置清海军于此，同时改镇城为清海镇。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清海军，在（庭）州西七百里。旧名镇城镇，天宝中，改名清海军。”

宋元之际，西域局势动荡，政权更迭频繁，西辽、察合台等相继统辖天山以北地区。元朝曾先后设置宣慰司和北庭都元帅府管辖天山北路事务。明朝时期，石河子属蒙兀儿汗国。15世纪前期，卫拉特部逐渐控制准噶尔盆地，石河子一带成为其下辖的一处游牧区。清朝统一西域以后，天山北路成为其开发建设重点区域。1778年，清政府在玛纳斯河东岸设置绥来县，石河子发展成为绥来县城西约30里的一个乡镇。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省，对省辖各县的乡村统一编制，石河子被划归绥来县西乡下辖的石河子庄。据《新疆图志》记载：“（石河子）汉、回铺户五十余家，回民礼拜寺一处。附近村庄相属，为绥邑第一乡镇。”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

多元治理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早在史前时期，石河子一带就成为不同文化汇聚交流之地。考古人员在玛纳斯河畔十户窑村清理出土120余座墓葬，遗存年代跨越青铜、早期铁器和唐朝等三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出土的女性装饰物——臂钏，其开合式的设计以及旋转锥形装饰具有鲜明的青铜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分布于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特征。这说明石河子一带自远古时起就是人类多元文明的交汇之地。不同的历史时期，石河子一带先后处于乌孙、突厥、唐朝、西辽、察合台、元朝、清朝等政权的统治或影响之下，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此地得以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在此催生出道多元文化，这里一度成为各民族交流融合的要衢。

中央统辖强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代中央政权在新疆的屯垦政策，不但促进了新疆的稳定发展，也使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达到了相当高度。西汉时期，中央政权为了应对西北边疆经略中用兵与军需问题，开始在新疆践行“屯田戍边”之策，“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这一政策为历代沿袭和发扬。石河子一带大概于唐、清两代成为中央政权主导的屯垦开发重地。大量屯户进入石河子，带去了铁犁铧、牛耕以及灌溉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与各民族在经济活动中相互协作、互通有无，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由此得到深化。

贸易往来丰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石河子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的关键节点，是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中转站。石河子在唐朝时地处北道交通要冲，是清海镇的治所。清代，这里已经发展成为服务北道交通往来的补给

历史上的屯垦重镇石河子

□ 郑婕

要地，无数的商队、使者、军卒经此东去西往。中原的丝绸、茶叶、陶瓷等商品与西域的珠宝、香料、马匹等在此完成了空间上的交换，极大地丰富了东西方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与心心相通。

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战略要地

自汉代以来，历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西域的战略地位，通过设立行政机构、推行屯垦戍边政策，将石河子纳入中央政权的管理体系。石河子历经唐朝的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元朝别失八里等处宣慰司，以及清朝伊犁将军等中央政权的管辖。这种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相结合、军事管理与行政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方式，既确保了中央对西域的有效控制，又充分调动了当地各族人民参与国家治理、保持边疆稳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形成。

在军事防御方面，石河子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一座清代所建的烽火台——山丹湖烽火台。这座烽火台呈覆斗形，高3.5米，由黄土夯筑而成。根据2014年出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清代烽火台的分布线路共有三条：北线烽火台的走向与古代丝绸之路的北道基本吻合，而石河子境内的山丹湖烽火台是这条道路的重要节点。这座烽火台不仅体现了石河子在交通和军事领域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彰显了这一地区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护边疆稳定所构筑的重要防线。

在抗击外敌入侵方面，包括石河子地区在内的新疆各民族展现出忠诚勇敢的爱国精神。1870年，阿古柏率浩罕军侵占乌鲁木齐后，又袭取玛纳斯河西一线。当地民众在首领赵兴体等人组织下成立民团，在北沙山子（今莫索湾）修筑城堡多座，边防边防，长期与入侵之敌进行斗争，其活动范围以西营城（今石河子境内）为中心，东起马桥子城（今呼图壁芳草湖），西至小拐一带，与其他几支民团组成了一道共御外敌入侵的牢固防线。赵兴体所部虽为民团性质的地方武装，但在驻疆清军几度惨败溃散、玛纳斯河流域几乎没有常驻官军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屯垦练兵前后10余载，成为当地抵御外侵、保卫家园的一支主力军。1876年，他们配合入疆剿匪的左宗棠部一举收复了玛纳斯县城。这一壮举彰显了石河子各族人民不屈不挠、团结一心的爱国精神，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世界读懂中国开启一扇窗

□ 胡文婷

回顾中外文化交流史，诸多海外汉学家如同一条条纽带，连通中外文化，并将古今中外交织成网，缀上“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之花，尤其在让世界各国深刻理解“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真正读懂中国方面有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译典籍，让世界认识中国。典籍记录并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对其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译介不仅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题中之义。典籍外译最早溯至16世纪，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作为“中学西传”的核心议题，其内容涉及文化类 and 科技类，其文本包括汉语典籍及少数民族文献。当对外译书目进行统计时会发现，汉学家一直是中国典籍外译的主力，从最早的来华西人如利玛窦、罗明坚等到近现代专业汉学家儒莲、卫礼贤等，他们或节译或全译，将“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译成多种西方语言，西译的典籍为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提供养料，并为西人认识中国奠定文本基础。

相较于中国译者，海外汉学家的译介行为属于典籍翻译中的“译入”，凭借着对目的国语言、文化及读者特征的了解，他们的文本选择、译介策略及出版形式较少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较大程度提升了中国文化的传播效率和影响范围。汉学家的“译

入”与中国本土学者的“译出”，好比中国典籍译介的一对翅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需要在坚持文化自觉和本土立场的前提下，将本土的“译出”与汉学家的“译入”密切结合，并在语种、选材、出版、传播等方面相互配合，才可实现中国典籍外译的“一体两翼”协同发展。

授汉语，向世界讲述中国。王国维曾提到“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汉语书写中国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对于汉学家来说，汉语更是讲述中国的重要工具。为了学习和教授汉语，他们或编纂词典或研究语法或撰写教材。他们不仅通过理论和实践在形、音、义等方面发现汉语的新特质，还是中国方言、谚语、俗语的记录者和使用者，他们“由古至今，文到语”的汉语观拓宽了历史比较语言学 and 汉语本体研究的范畴。

另外，海外汉学从研究汉语汉字开始，并通过教授汉语汉字进行身份界定和代际建设。从法兰西学院到各个国家的汉学系、东亚研究中心、中国研究所等，汉语课程的设立和讲授是其发展的基础和重点。当代汉学家多是一方面投身中国文化研究，一方面致力汉语教学，并在推动汉语的学科化、本土化和社会化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国和意大利已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制定了汉语教学大纲及教材，促进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化建设，同时还就

课程设置、师资培训、教学模式的本土化进行探索，这背后离不开本国汉学家如白乐桑、马西尼的支持和努力。再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为例，他曾在哥德堡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汉语，并面向公众出版汉语入门书籍《中国语与中国文》。该著作以不同语种再版多次，打破了汉学的专业壁垒，推动了汉语的国际化进程，为普通民众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开辟了更多的空间。

总的来说，汉学家们将对汉语的学习和研究落脚在汉语讲授中，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也是培养青年汉学家、促进汉学蓬勃发展的关键。

研学术，让世界读懂中国。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研究常被视为“他山之石”，不仅在异域垒石成山，展现中华巍峨之貌，还能以石琢玉，助力本土学者反思、拓展传统的学术边界。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虽浮光掠影，却凭借对中国地理及物质的记录进一步打破了欧洲自希罗多德时期对中国的“赛里斯”想象。之后旅华的商贾、使节和游人则开始结合实地经历和书籍信息为欧洲描绘了更为翔实且具体的中国形象，像加斯帕·达·克路士的《中国志》便是欧洲学者撰写、叙述中国的案头必备。

17至18世纪被荷兰汉学家普理和称为“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这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

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这一时期，在经历了之前简单零散的记录和描述阶段后，早期的汉学家开始在真正意义上研究中国，包括语言文字、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科学艺术等，中国知识也由此源源不断地进入欧洲，成为欧洲社会思想及政治制度重构过程中常常借鉴的“中国之镜”。19世纪专业汉学兴起，汉学家对中国知识的生产及研究则过渡到学院派模式，主要特点是补充研究资料、创新研究方法及转换研究视角，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理解。中国知识全球化内涵就此体现，本土学者也借此“异域之眼”，丰富并滋养了中国学术的研究体系和范式。

但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汉学家在进行汉学研究时，或多或少会受到文化差异及文化隔膜的影响，进而不可避免产生一些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主观判断和研究结论。这便要求中国学者在同汉学家对话时，拥有鉴别能力、坚持扬弃态度，这也正是国内开展海外汉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即真正实现中国学术与海外汉学研究的良性互动，通过互鉴推动文明共生。

